

聚焦

2012:让消费、创新、实业致富的动力落在实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2012年的经济格局将呈现出变化无常的态势。由于欧债问题凸显出欧元区机制的内在缺陷,美国经济在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的“瘦身”行动和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中呈现出来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象,以及当年处在世界制造强国地位的日本经济在核污染压力、高财政赤字和低福利水平冲击下更趋疲软的格局,都会给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带来巨大的挑战。

面对世界经济的诸多不确定的因素,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很多外部性的因素,虽然同样具有结构性和周期性的差异,但是,如果没有经济社会强有力的改革作为基础,那么,我们再怎么推动也不可能缓解外部社会的矛盾和由此带给我们的伤害。

笔者认为,当前,解决“结构性问题”关键在于改革封闭的要素市场

供给面: 需要鼓励扶持产业发展的“价值投资”大军

从供给面上看,今天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中更加明显暴露出一些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首先,推动30年高速增长“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其次,“民工荒”现象和老龄化趋势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很大的改变,它更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目前就已经具备了欧美创新型国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其次,作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中国,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今后依然坚持对外出口的增长方式,来谋求像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所获得的“全球红利”,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目前就可以专心来打造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第三,回顾中国经济这30多年来走

世界经济的诸多不确定的因素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建议今后中长期的改革方向应该坚定不移地做好以下几件事情:一是要大大地增加教育投入的比例,为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的需要提高国民素质。二是要通过完善各类制度强化对企业家和投资家的保护和尊重,以避免人才的不流失和创造高附加价值产业社会动力的不足。三是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把政府财富创造的机制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嫁接到市场活力的打造和民富水平迅速提高的制度安排上,否则,我们期待的消费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实业致富动力都会大打折扣。

过的发展历程,我们都会注意到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最后,由于像“金砖五国”这样的巨大新兴市场的崛起,打破了一直由欧美发达国家所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源需求格局,从而导致了资源稀缺问题变得更为突出,环境恶化现象变得更为明显。于是,中国再想像过去那样不计较“资源红利”的约束谋求自己的发展模式,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目前欧洲积极倡导的低碳经济和环境优化政策代表了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没有解决环境成本公平分摊的格局下,可以强行放弃中国具有鲜明比较优势、而人类生活又不可或缺的传统制造业。

所以,面对上述挑战,我们建议今后中长期的改革方向应该坚定不移地做好以下几件事情:一是要大大地增加教育投入的比例,与此同时强化产学研结合的各项制度设计,另一方面,产业结构整体升级需要我们通过普及义务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否则,自主创新就无法真正落到实处。二是无论对企业家还是投资项目都要通过完善各类制度来强化权益的保护和尊重。因为当一个社会进入到创新型发展阶段的时候,无形资产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比例要超

过固定资产投资所做出的贡献比例,对社会无形资产价值的回报不重视,对个人所拥有的权益不保护,那么,人才就会不断流失,创造高附加价值的社会动力就会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即使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格局变化,但是,如果对它们的投资回报不给予应有的保护,而任金融市场的违规操作和银行体系金融资源垄断的格局发展下去,那么,中国就不可能出现一批扶持产业发展的“价值投资”大军。短时间内民间渠道所凸显的“钱流”问题就可能被长期化、泡沫化。三是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把政府财富创造的机制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嫁接到市场活力的打造和民富水平迅速提高的制度安排上,避免政府干预过多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流动性波动过大的局面,根本改变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垄断行业和土地财政的领域。否则,我们期待的消费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实业致富动力都会大打折扣。

需求面:城市化与财富集聚如何推动内需

从需求面上看,我们发现消费不足的现象有着很多内在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是“没有钱消费”的问题。今天我们

非常希望通过中西部城市化的推进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目前我们还是感到楼宇经济的发展对当地经济的增长贡献很大,并没有形成其他国家所看到的产业集中,消费网点集中的现象。因此,真正意义上能够带来消费水平普遍提高的城市化进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其次,是“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今天沿海城市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的同时,却出现了没有把自己先富起来的财富作为推动中国内需的动力,反而是因为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后顾之忧”增加而导致的储蓄,甚至储蓄的方式集中在楼市和欠成熟的金融市场,造成了虚拟经济过度繁荣的根源之一。第三,是“有钱不在国内消费”的问题。今天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差距”的问题。但是,还处于少数群体的中高收入阶层在中国选择投资而不是消费,而在海外他们却是慷慨的消费,以至于今年我们有可能超越日本成为奢侈品消费的世界第一大国。有人认为利用税收杠杆可以缓解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社会不和谐因素,而且还能通过收入转移的社会福利政策来刺激低收入层的消费水平,但是,我认为这种认识是很有偏颇的,如果对于合法的“多劳多得”的企业家、创

新家和投资者给予重视待遇,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就可能因为资本外逃或避税行为而大受影响,同时也很容易形成像南欧社会缺乏实业致富精神的社会风气。

制度改革:让经济增长的活力转化为消费动力

面对上述挑战,我们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而且坚定不移的朝着我们坚信能够成功的方向继续努力。一是探索农村土地改革的机制设计。让农村财富能够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越积越多,为当地让农民尽快致富的城市化建设和农业机械化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二是加快公平有序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改革,处理好由此产生的工作动力与工作压力之间的平衡关系。通过激活市场和缓解后顾之忧的制度变革,来提高大众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以此带动中国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水平。三是提升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和消费市场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打破垄断和扼制投机,让更多的产业资本回到能够提供面向国内消费群体而创造财富和提供高水平服务价值的实体经济舞台上。同时,要通过法制社会的建立来大力扭转“真假难分、价格扭曲和消费安全感很低”的社会环境,切实保护好具有消费能力群体的消费愿望和由此带来的幸福感。真正形成让先富起来的人通过消费这个市场渠道来带动中低收入者的财富增长,让他们也尽快进入到改善自己生活质量的消费时代。我们的企业也因此能从内需的增长中分享到利润增长实业致富的快感,以避免中国消费水平的提高与本土企业利润增长、就业水平提高相脱节的现象。

观点

不能脱离中国经济的复杂现实和盛行的发展模式,孤立地看待中国消费问题。应采取一种真正以民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央政府的目标,以及与之保持高度一致的地方政府的经济目标,都应该将“家庭可支配收入”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准,以此扭转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促进经济价值从政府及企事业单位重新回归到国民,使地方政府与公民的利益更加统一。

发展经济的目标应转向“家庭可支配收入”

浙江大学研究员 全球政策研究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 杰拉奇

自2008年以来,经济界热门,即中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最关注的主题,就是如何平衡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它从严重的出口依赖中解放出来。然而,在已提出的方案中,有很多显得过于狭隘和简单。

举例来说,有人支持通过商品折扣或补贴等鼓励人们消费,从而刺激内需增长,提高国内消费水平并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性。此方法虽可能带来短期效益,但笔者并不认为它切合实际、长期可行。因为它治标不治本——事实上,这个方法好像只是孤立地看待消费问题,却脱离了中国经济的复杂现实和盛行的发展模式。鉴于全球金融危机仍在持续,甚至可能恶化,这种失败的不良后果将更加严重。

对于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迅速地回到一个由国内经济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保持它能够长期、持续性地执行。

依笔者之见,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面临的挑战有如下几点:

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对凯恩斯主义发展方式和出口型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由财政的高水平公共支出,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所支持的。这种模式一方面提高了GDP的增长率;另一方面也导致个人收入水平无法快速增长。也就是说,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价值已从个人手中转移到政府和公司企业。

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房地产业。大量非房地产企业仍以房地产的价格增长作为其利润来源,因此经济对于房地产业的依赖程度其实已超过官方公布的数据。从根本上说,房地产业是非生产性质企业,无法提高中国经济所需的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

个人消费受其低收入者的限制。与普遍看法相反,中国人并非节省大部分的支配收入——少量花销是由于可支配收入较少。

社会缺失其安全保障系统。这个系统应包括教育、医疗、养老金等。这个系统的缺失进一步恶化了当前社会形势,也会使收入增长的人群倾向于存款而非消费。

农民的大量进城导致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城市化的进程。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迁徙入城的农民工作良好,那里资源丰富,人口较少;中国的过去三十年里亦是如此。但是,世界范围内并无实例可说明,拥有两千万或更多定居人口的城市的确运作良好。将来,中国城市及其居民却可能面临无法预料亦不稳定的挑战。

最后,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的缺失。这些文化和价值如今都只出现在电视剧和博物馆中了。但这些价值观,即使在国家动荡时也有助于社会保持稳定,促进人民互相帮助。

笔者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首先应转向一种真正以民为本的发展模式,即使它们可能放缓经济发展的步伐。中央政府的目标,以及与之保持高度一致的地方政府的经济目标,都应该将“家庭可支配收入”,而非GDP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准,以此扭转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应促进经济价值从政府及企事业单位重新回归到国民个体,这样做将使地方政府与公民的利益更加统一,从而减少其利益冲突,增加其信任互助。作为个人收入增长的副产品,由通货膨胀带来的恐惧也将很大程度上得到消除。

视线

刚刚过去的2011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不小。即使现在CPI下来一些,防止通货膨胀的反弹依然是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而形成前段时间国内物价水平高企的原因很多,但一段时间以来,国内舆论普遍将通胀归咎于前些年出台的影响规模达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

笔者认为,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对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提出些批评本应是一分为二的后半,而一分为二的前一半则是要看到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主流,这就是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压力,保持中国经济的成长势头。

大体上看,2008年出台的“四万亿”资金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运用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另一个则是用于改善民生。现在看来,无论是实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是实施民生工程,都是着眼于弥补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而这两件事本来就需要加大力度来做。即使没有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即使没有出台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加强,中国的民生也要改善,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必须克服各种各样的瓶颈约束,只不过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打乱了正常的建设节奏,所谓铺摊子容易,摊子难。

观察

□ 叶梓

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于2011年末下发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本次修订取消了对外商投资医疗机构和金融租赁公司的限制,并将外商投资汽车整车制造项目从鼓励类中删除。此外,基础电信业务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也有所扩大。与此同时纺织、化工、机械制造等领域新产品、新技术高端制造业以及废旧电器电子产品、机电设备、电池回收等循环经济和服务业成为鼓励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

对外商投资领域限制与鼓励方向的变化,显然将使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战略战术开始发生调整。

三星研究院最近发布了一个名为“2012年跨国公司的弱势生存术”的研究报告,对跨国公司“以‘转型’来应对中国市场竞争背景的变化作了很好的分析与描述。

事实上,将自己在中国的地位描述为“弱势”从而开始从战略上考虑“弱势生存术”,这对于跨国公司可能是第一次。众所周知,改革开放的开放,首先意味着对

此外,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对于中国经济及早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压迫中解脱意义至关重要。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上半年,我国的对外贸易可以说遭遇了严寒。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逐步实施,中央定下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方针才得以实实在在地贯彻执行,实现了中国经济“西方不亮东方亮,提外损失提内补”的局面。

另一方面,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企业缺少订单,有了“四万亿”作为底气,依靠着国家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及支持出口企业“转内销”等一系列政策,一批出口企业熬过了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期。随着国际市场需求形势好转,许多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之所以能够捷足先登,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当时依靠“四万亿”所带来的国内市场机会过冬。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在世界经济形势逐渐好转之后,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达到10.4%。

因此,毫无疑问,对于暂时遇到外部刺激而出现“心梗”的中国经济,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可以说是一次及时的“人

工呼吸”。如果当时没有做到及时出台有分量的经济刺激计划,暂时的“心梗”很可能会发展为脑组织的坏死、肾功能的衰竭、心脏跳动骤停等不可逆病理现象。到那时,再想起做“人工呼吸”晚矣,要么救不活,要么顶多是救活一个植物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年国家及时出台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初衷并无不妥。

至于前段时间的通货膨胀,不能说与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没有一点关系,“四万亿”毕竟是国家对生病的国内经济采用对口这个“笨”办法进行“人工呼吸”,前段时间的通货膨胀或多或少有一些是因为对国内经济紧急进行“人工呼吸”而不慎所染上的传染病。不过,

将前段时间的通货膨胀完全归咎于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也并不是很公道。

应当看到,由于美联储两次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促使流动性泛滥、中东北非政局动荡增加了油价形成过程中的风险溢价成分、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加大了对大宗商品的需求等方面因素的叠加作用等等,前段时间的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输入性通胀成分。

除了输入性通胀因素外,造成前段时间通货膨胀的因素还有许多。例如,周期性因素导致猪肉价格暴涨,进而带动鸡蛋、水产品、牛肉等替代品价格的跟风上涨。又如,制度性因素造成了国内石油企业在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

跨国公司在“弱势生存”下的转型战略

2011年岁末,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下发《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对外商投资领域限制与鼓励方向的变化,使许多跨国公司在发展的战略战术开始了“转型”调整。

跨国公司的开放,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与国内的企业比,其“超国民待遇”一直甚至让国内企业和民企都耿耿于怀。

风水轮流转。突然,跨国公司纷纷感到在中国享受政策VIP待遇的日子过去了。2009年,中国政府彻底取消了过去外资曾在中国享有的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政策。不仅如此,苏州、无锡等华东富庶地区纷纷提高投资门槛,对新进的外资企业,不仅没有专门的优惠政策,甚至还对其产业类型、节能减排方面提出很高的要求。与此同时,中国本土企业的飞速崛起也使得多年前曾傲踞生态链最高端的跨国公司,资源不如国企,灵活度又逊于民企,被窘迫地夹于两者之间。而人才的流向更是充分说明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地位的转变。2011年一份有关大学生就业倾向的调查中,

“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已经取代“外企”成为最热门的工作机会同时,外企也不再是商业精英的首选,许多外企经理人纷纷“回流”涌向了国企、民企。

于是,正如“2012年跨国公司的弱势生存术”所描述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生存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们的心态也越来越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表现出“弱者心态”的特征。然而,中国市场依然是全球金融危机阴影不散趋势下最有希望和吸引力的市场。为此,在“弱势生存”的心理状态下,跨国公司纷纷采取了新的策略。

据三星研究院的这份报告,这些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服务为导向进行业务转型。利用自身的技术和专长,在服务领域为中国客户提供更大的价值增

值,做中国本土企业做不了的事,是跨国公司未来的最重要调整方向。

不少过去以“销售产品”为重点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将业务重点转向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并利用差异化锁定客户。例如,美国赛门铁克公司(Symantec)过去在中国更侧重于网络安全软件及硬件产品的销售。现在则日益以服务为导向,为中国市场上的企业和个人用户提供广泛的内容和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其服务人员从过去的个数增加到200多位,包括技术服务、顾问服务等。

其次,树立“与中国企业‘共赢’”的理念,开展更广泛范围的战略合作。

随着中国市场竞争形势的改变,跨国公司越发意识到,除非是一个消费群体非常明确、品牌非常强势,拥有广泛销售渠道的B2C企业(例如一些奢侈品企业),可以在中国市场大包大揽,其他领域的跨国公司则日益需要和中国本土有实力的企业加强合作来实现业务拓展。预计这种与中国企业“共赢”的理念,将为更多跨国公司所接受,并渗透

到其与中国政府、供应商、消费者等多个层面的关系中。

第三,更为积极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2011年3月,由社科院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显示,目前我国外资百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平均分偏低,引来舆论一片哗然。面对这种情势,外资企业意识到在社会责任方面投入的重要性,在塑造企业文化的同时,可以博取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好感,让自己与中国更加“亲近”。一些有远见的外资企业已经在作出改变,例如,美国的思科公司专门在中国成立企业公民部门,司职CSR(企业社会责任),并且除了过往的捐款救助之外,也更多的开始关注员工、关心弱势群体。

跨国公司针对中国市场和政策的变化开始的主动“转型”,值得中国本土企业关注与学习。事实上,这种“弱势生存”心态下的强有力转型,很可能意味着伴随中国整体经济转型的过程,一批跨国公司也将再次占领中国市场产业链的高端而成为“强势”企业。